

景德瓷艺结津缘

罗文华

前不久,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产”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千年瓷都的窑火被赋予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非凡意义。天津与景德镇虽然相距两千余里,但是“瓷缘”深厚绵长。数百年来,天津作为景德镇瓷器在中国北方重要的转运、营销、收藏和展示中心,对向海内外传播景德镇瓷器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
年近八旬的曲来云先生曾是天津城建系统的一位工程师,业余痴迷于收藏。各个时代的瓷器,各种器型、胎釉、纹饰的瓷器,只要具有观赏和研究价值,他都尽力集存。通过收藏景德镇瓷器,他保护了很多文物。

曲来云先生的老家是山东德州,祖上传有一对清代郎窑红瓶。在特殊时期,亲属怕抄家,欲将这这对瓶砸碎扔掉。曲来云先生当时正好回老家探亲,便冒险将它们藏在牛棚里。家里很多被视作“四旧”的东西都被毁了,这对瓷瓶却幸运地留存下来。20世纪80年代,他从德州老家把它们带到天津,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观赏。郎窑红是清代康熙时期仿明代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,因康熙年间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,故以其姓名命,亦称郎红。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,代表了景德镇瓷器制作的高水平。

《不要小看民国瓷》是我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,其中写到天津多位景德镇民国瓷器收藏家。已故张仲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深厚的天津民俗专家和文史专家,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收藏家和鉴赏家。他除了收藏造命、字画、民俗用品外,还喜欢收藏各种纪念瓷,以景德镇民国初期出品的辛亥革命纪念瓷最有特色。我曾观赏过他收藏的三十多件辛亥革命纪念瓷,其中包括绘有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的辛亥革命纪念茶壶、茶杯、糖罐、笔筒等。当初,这些小件的瓷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,张仲先生往往花上十几元或几十元就买到手;如今市场上真品难见,而且张仲先生的藏品已成系列,弥足珍贵。这些百余年前面世的辛亥革命系列纪念瓷充分说明,景德镇瓷器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,而且具有



历史实证价值。

郭沫若先生参观景德镇时曾留下“中华向号瓷之国,瓷业高峰是此都”的诗句,高度概括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辉煌成就。2004年是世界瓷都景德镇建镇1000年,天津电视台《艺术品藏拍》节目播出了一部系列专题片《走进景德镇》,通过实景拍摄向观众展示“集天下名窑之大成,汇各地良工之精华”的景德镇瓷器的制作过程,吸引了众多收藏爱好者。这部系列专题片的艺术顾问,身兼摄制组在景德镇的向导,是身居天津的景德镇瓷器收藏家李传宗先生。

李传宗先生是景德镇人,原在当地从事瓷器制售行业,20多岁移居津门,仍然醉心于瓷器收藏。20世纪90年代末,他在天津市政协俱乐部成功举办了景德镇瓷器个人收藏展,深得天津瓷器收藏家们的青睐。21世纪

伊始,他在天津建起“古雅细瓷坊”,常年展示推介当代景德镇镇工艺大师的精品,这里也成为天津瓷器收藏界一个知名的交流场所。李传宗先生每年多次往来于景德镇与天津之间,成为促进两地瓷器文化交流的一位使者。

李传宗先生收藏的景德镇历代瓷器精品,我见过数百件。他对素三彩、青花、釉里红、五彩、珐琅彩、粉彩、新彩、墨彩、色釉和瓷雕等如数家珍。经过在艺术品市场的长期实践,他把收藏重点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景德镇瓷器上。他认为,改革开放初期,景德镇一些老艺人还健在,他们的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,留下很多精心之作。而且那时的瓷器使用柴窑烧制,成品很有韵味;不像后来普遍使用气窑烧制,瓷器的工艺色彩已经更多地被工业色彩所取代了。多年来瓷器市场行情的发展和变化,证明他当初的判断是很有预见性的。

后来,李传宗先生离开客居二十余年的天津,回到家乡景德镇继续从事瓷器研究,尤其专注于“567时期”(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)陶瓷文化的研究与传播,颇有成效。

如果说李传宗先生是将景德镇的窑火传播到津城的践行者,那么世居天津的华非先生就是从津城到景德镇探取窑火的践行者。

2023年以90岁高龄去世的华非先生,集篆刻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陶瓷艺术家和收藏家于一身。其陶瓷工艺作品,造型别致,构图奇突,刻塑精到,流光溢彩,在注重绘画效果的同时,也充分表现出陶瓷的材质特点,艺术性与工艺性达到完美统一,这是单纯的画家和单纯的陶瓷工艺师都难以做到的。在他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,曾经多次到景德镇开展瓷艺实践,一住就是数月。他的足迹几乎踏遍瓷都的古窑址、民间制瓷作坊、瓷器市场、博物馆等处,还亲自蹲在窑炉旁观察装匣、满窑、点火、升温、控温、冷却、出窑等各个环节的情况,从燃烧的窑火中获得了大量的直接经验和创作灵感,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瓷艺水平,完成了《陶醉》《双鱼》《幽林》《黄河之母》等瓷盘佳作,赢得海内外艺术收藏家的喜爱。20世纪80年代,中央电视台曾为华非先生拍摄过一部专题纪录片,叫作《火的艺术》。

日前,我参观了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中华器物艺术高等研究中心实验室,但听锤凿之声清冷有韵,正在伏案认真刻瓷的青年艺术家华磊先生,是华非先生的文孙,也是津派华氏刻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。从家族书斋走进大学讲堂,从传统文人雅玩走向现代设计平台,新传着景德镇的千年窑火,彩刻着瓷盘上的津派文化,新一代艺术家如华磊先生正在努力继承传统艺术,在自己手里创作出更高层次、更新意境的作品,实在令人欣慰。

题图为天津著名收藏家、陶瓷艺术家华非在景德镇创作的瓷光作品。

的会计。可乡亲们不再叫他“徐会计”,依旧亲切地喊他“徐老师”。这一声称呼,比会计的职务,在乡亲们心里分量更重。

大哥和我相继中学毕业。父亲让我们都报考师范学校,是想弥补自己没能读师范学校的遗憾。大哥早我6年毕业,主动申请前往川西地区中学任教。我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乡村小学。川西地区和乡下的条件比不上城市,父亲常常叮嘱我们踏实教书,不要辜负国家的培养。农闲时,他带着土特产,辗转路途来看我们。那时校园已经大变样,水泥讲台、玻璃窗、正规黑板,书本齐全,录音机、幻灯投影走进课堂,乡村教育一步步走向规范化。

“一个也不能少!”九年义务教育全面铺开。我和大哥曾徒步下乡劝返辍学的学生,摸清孩子的难处,拿出微薄薪资帮扶家境困难的学生。寒暑假,我们到进修学校学习新的教学方法。后来大哥转行到宣传部,常给通讯员讲授新闻写作,熟人依旧叫他“徐老师”。而我,至今还站在三尺讲台,我这个徐老师,一直会干到退休那天。我们会把父亲传下来的那份为师的本分牢记于心。

两个女儿大学期间考取了教师资格证。毕业后,在我的鼓励下,姐妹俩也先后选择从教。我们分工协作:我搜集招考信息,她们全力备考。白天上班,夜里自学,爱好全部暂时放下。历经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政审、公示,姐妹二人成功考取了教师编制。当年我去乡村小学报到,没有公路,父亲扛着行李送我,帮我打扫寝室。如今轮到我送女儿入职。高铁直达,大件行李提前寄到学校,一路轻松便捷。走进大女儿的校园,智慧黑板、多媒体设备、线上教学资源一应俱全。她被安排教一年级语文,报到之后马上参加新课标培训。学校占地近150亩,学生将近5000人,办学条件和我当年教书的乡村小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大女儿很快就适应了岗位,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和认可。

三代从教,岁月流转。“徐老师”,成了我们家特别的名片。几十年光阴过去,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不变的是我们三代人对教书育人这份职业的敬重。老家大门上一直贴着这样一副对联:代代躬耕三尺地,绵绵不负育人心。

三代徐老师

徐成文



我家三代出了五位教师——父亲、大哥,以及我的两个女儿。我们都叫“徐老师”。大队原来的老师调回城里,一群农村娃没有老师上课,支部书记十分发愁。三十多岁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,却是当地少有的“文化人”,彼时担任大队会计。书记找到父亲,半是嘱托半是恳求,让他接手学校的教学工作,会计工作转交他人。

父亲并非科班出身,教书对他而言困难重重。一个星期天,他一早赶到公社小学去找校长。校长得知班里没有教材和作业本,便把一大堆毛边纸送给父亲,把自己用旧的教材送给了他。父亲走上讲台。他将毛边纸裁剪、装订成作业本发给孩子,用最朴素的办法教学:在黑板上写下教学内容,让学生照抄。难题解决了,村民们十分认可,几个打算退学的孩子重回教室。父亲后来跟我说,那时办学条件极差:土坯教室遇雨漏水,课桌打湿了,学生只能站着听课;所谓黑板,只是土墙上刷了黑漆;窗户是简易木条,寒冬时节冷风直往里灌。

身为民办教师,父亲薪资不高,责任心却不输公办教师。农活儿耽误了上课,他一定找时间补上。白天下地劳作,夜里点着煤油灯备课,经常批改作业到深夜。全公社15个民办教学点,他班上的成绩排名第一靠前。他常说:“庄稼不好误一季,学生不好误一生。”不少放牛娃因为父亲放下牛绳,走进了课堂。

后来村里分配来公办教师,父亲又做了大队

秋天来了。趁着夜色里的微凉,它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城市的肌理。清晨,玻璃窗上凝结了一层薄薄的水汽,用手指一划,便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,但很快又有了新的水汽。像极了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,一切痕迹到时生成,又被迅速覆盖。站在阳台上,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一声。解锁,朋友圈里显示一张图片:金黄的银杏叶铺满石板路,滤镜调得恰到好处,带着一层复古的颗粒感。配文是:“人间秋短,且看且珍惜。”这一刻,我经历了数字世界里一场虚拟的秋游,消费了秋日美丽,却也不必承担旅途的疲惫。

数据流裹挟的时代,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秋天,却又比任何时候离秋天更远。很多人不再依靠皮肤的触觉去感知气温的骤降,而是通过手机弹出的天气预报;我们不再倾听风穿过林梢的呜咽,而是刷着短视频,听着被配乐渲染过的秋声。秋天,变成了许多高清的像素点,变成了社交平台上被反复咀嚼的符号。人们在朋友圈里“种树”,在公众号上“赏花”,在网络上“悲秋”,唯独忘记独自一人,坐在公园长椅上,实实在在地发一会儿呆。

出门走向十六潭,人行步道两旁的银杏树叶果然黄了。三三两两的人,举着手机,寻找着最佳的拍摄角度。他们退后,弯腰,仰拍,试图把秋日树木的辉煌压缩进小小的手机屏幕里。“咔嚓”一声,定格。然后便是修图,饱和度,对比度,将一片飘落的叶子定格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。这,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。秋天,成了这场表演宽阔的布景。

想起过往没有手机的秋天,秋日的乐趣全凭感官去捕获。走在路上,会捡拾形状完美的树叶当作书签;会将几粒苍耳,偷偷粘在同行者的衣服上。那时候的秋天有滋有味,带着泥土和果实成熟的气息。如今的秋天,更多的是手机握在手上运行时,那种微热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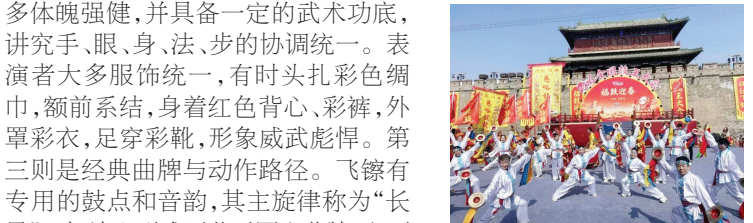
数字时代,在另一方面也为秋日思绪提供了全新的容

汉沽飞镲,这一源自渤海湾畔的古老民间艺术,是集音乐、舞蹈、武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广场艺术形式。如今,它不仅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文化瑰宝,更是中国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,也是河海文化的生动注脚。“镲”是一种打击乐器(又称钹),也是一种常配有红绿色绸带等饰品的舞蹈道具;“飞”则指队员表演动作幅度大,表演时带着绸子的镲处于“飞舞状态”,其演出特点是边演奏边飞舞,讲究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的配合。

汉沽飞镲的根脉深植于当地渔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。这项民间艺术最初为出海捕鱼过程中的渔猎信号,后来慢慢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艺术。其演变历程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从实用工具到精神艺术的发展图景。根据地方史料记载,汉沽飞镲大约产生于清朝光绪初年。其最初的形态与渤海湾的渔业生产密不可分。旧时渔民们出海捕鱼,渔船上常备有鼓、铙和镲,这些乐器最初具有实用功能:一是利用鼓镲之声引诱鱼群入网;二是在浩瀚的海面上,洪亮的声音能传至远方,成为渔船之间传递讯息、协同作业(如撒网、收网)以及渔船归港时向家人报平安的信号,渔民们称这种敲打为“打喜”。这就构成了汉沽飞镲最原始的雏形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飞镲的功能逐渐演变,并逐步走向艺术化。其形态从单纯的生产工具向祭祀、庆典和娱乐方向拓展。飞镲表演最初是在出海的渔船上进行的,后来逐渐出现了以渔民祈禱海神保佑为目的,在陆地上展示的飞镲表演。渔民们将日常海上作业的动作(如拉网、扬帆)融入镲技之中,并在参与庙会等活动后,将一些宗教仪式音乐(如“敬香”曲牌)带回渔村,进一步丰富了其内容。由此,飞镲从海上走向陆地,从渔村扩展到城镇,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,最终演变成为一种集民间打击乐、舞蹈、武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形式。

汉沽飞镲的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听觉震撼力,其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是核心道具与乐器。汉沽飞镲中的镲,既是核心乐器,也是主要舞蹈道具。传统上,一对镲重约七斤,现代表演用镲重约为四斤。镲上装饰有红、绿、黄等颜色的绸带(镲缨),舞动时五彩斑斓,分外醒目。除了主乐器镲外,还有一些伴奏的乐器,主要包括一面大鼓和两至四对大铙。大鼓鼓面直径通常在80厘米以上。表演时,鼓定节奏,铙、镲丰富音色与层次。第二是表演阵容与服饰搭配。“汉沽飞镲最典型的‘打场’表演通常需要24名飞镲表演者。他们多体魄强健,并具备一定的武术功底,讲究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的协调统一。表演者大多服饰统一,有时头扎彩色绸巾,额前系结,身着红色背心、彩裤,外罩彩衣,足穿彩靴,形象威武彪悍。第三则是经典曲牌与动作路径。飞镲有专用的鼓点和音韵,其主旋律称为“长量”。打法上形成了若干固定曲牌,主要包括《么二三》、《草子》(或称《吵子》)、《长量》、《进香》(或《敬香》)等。其中,《敬香十打》是最为著名和经典的曲牌,它由十个连贯的招式组成,每一打都有形象生动的名称,如“一打插花盖顶,二打古树盘根,三打张飞骗马,四打鹞子翻身……”充满了武术与舞蹈相结合的美感。表演动作幅度大开大合,刚劲有力,分上、中、下三路,风格粗犷豪放。第四是表演风格。整体表演场面宏大、热烈欢腾、激情四溢。鼓声铙声震天动地,五彩镲缨上下翻飞,形成锣鼓喧天、龙腾虎跃的壮观景象,极具感染力。



作为河海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,汉沽飞镲这一技艺已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表演,深刻承载着当地社群的历史记忆、精神信仰和集体性格。它是河海文化的活态体现,表现了渔民的海上生产与生活。它是对渔民劈波斩浪、协作互助的航海生活的艺术化再现,寄托着他们对大海的深情、对丰收的期盼以及对平安的祈求。它是地域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,其表演中蕴含的英勇无畏、一往无前、粗犷淳朴的气质,被认为是汉沽人民乃至天津滨海地区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。它象征着力量、勇气和乐观精神。它是地域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史上,飞镲深深嵌入地方的民俗生活。它不仅用于年节庆典、庙会(如农历四月的迁西景忠山庙会)等喜庆场合,还在改革开放后,融入了当地的白事(丧礼)仪式中,成为表达对逝者敬畏与送别的重要仪式符号,在当地被称为“出作”。

2008年6月,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,“汉沽飞镲”被列为传统民间音乐“锣鼓艺术”类的首位。后来也成为天津滨海新区首个国家级“非遗”项目,标志着其文化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定。

如今,汉沽飞镲不仅在当地春节、乡村振兴文化活动等场合大放异彩,也通过“非遗进校园”、京津冀文化交流研讨会等形式进行展示和传播。在汉沽滨海广场,矗立着一座高达6.2米的古铜色汉沽飞镲大型雕塑,成为该艺术的地标性象征。总而言之,汉沽飞镲,是写在铜锣与鼓点间,属于滨海渔民的精神印记。它从渤海渔船的劳作号子中走来,历经百余年锤炼,凝聚为一种承载着历史记忆、民间信仰与地域精神的独特艺术。作为河海文化的优秀载体之一,它既是需要精心守护的文化根脉,也是活在当下、不断演进的时代强音。

题图:2026年在正定古城举办的全国鼓王大会上,天津滨海新区文化馆表演《汉沽飞镲》节目。

数字构建的秋天,文字多是扁平的;而手中这本书,文字有重量、有温度,甚至有脾气。

雨停下来的时候,空气里有泥土翻新的气息。窗外的香樟树上还有雨点往下落。夕阳从云层缝隙里挤出来,给湿漉漉的地面镀上了一层金。

再次打开手机,看着各种群聊里的发送、寒暄、点赞。一位摄影师发了一组长图,记录了他眼里的晚霞。从橙红到紫红,再到深蓝。他写道:“云朵是天空的具象化情绪,今天它有点忧郁,但很美。”看着那组照片,我心中一动,蓦然发现,现代人其实是在两个秋天里穿梭:一个是自然的、物理的、不可复制的秋天,它遵循着二十四节气,缓慢而坚定地推进;另一个是数字的、虚拟的、无限复制的秋天,它由代码构成,瞬息万变,充满了各种杂音。人们的思绪,总会不由自主地被这两个秋天拉扯。

数字时代的生活,又怎能彻底逃离数字洪流?如此,不如在刷屏的秋景图中,筛选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瞬间,找到城市楼群中最偏僻的那片树林,静心欣赏似古画《秋山问道图》中的景致。不是吗?数字时代只是改变了人们接近秋天的方式。

窗外,秋风起落,树叶摩擦。这样的秋天,既有古意的苍凉,又有现代的喧嚣。我的思绪,像秋风中飘摇的落叶,在数字与现实的交界处,清晰而遥远。

数字时代的秋天

程应峰



器。一日,在一个公众号读到一篇文章,作者深居九宫山,他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山中秋色,蝎子草枯黄了,柿子树挂满了红灯笼,雾霭在山谷间流动。其间配有他拍的照片,没有过度的修饰,只有一种朴素的真诚。读完,一种久违的感觉传遍周身。那一刻,我触摸到了一个鲜活灵魂的秋对天的敬畏。

将数字工具用以延伸感官触角,看见多元的秋天,这也是很美妙的事情。我的朋友圈中,有一个对植物有浓厚兴趣的人,他每天都会分享一种正在结籽的野草,科普它的学名和药用价值。在他的镜头下,那些被行人踩在脚下的杂草,突然有了姓名,有了尊严。这以后,我散步时,便会留心观察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生命。数字工具,俨然成了认知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。

秋雨不期而至。雨点敲窗,发出密集的声响。我坐下来,翻开一本纸质书,是记述徐悲鸿的《笔下千骑》。纸张翻动时有沙沙的响声,油墨味道虽淡了,但依然有,让触觉和嗅觉有了复合体验,这是电子阅读器永远无法模拟的。

白露诗意

郑学富



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的诗句,写得更是别有味道,前一句点明时节的变化,为月夜增添了几分清冷,将白露的意境推向家国乡愁的高度。乱世飘零,客居他乡,白露始白,秋意渐浓,触目皆是萧瑟寒凉;后一句尽管月光普照大地,但唯有故乡的月色最为澄澈温暖,这其实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。诗人将羁旅之苦,乱世之愁,思乡之切尽数融入白露秋夜,让寻常的节气风物,承载起厚重的家国情怀。从此,白露便成了天涯游子寄托乡愁的信物,清冷之中满是温情与牵挂。

宋代诗词赋予白露一种恬淡清雅烟火意境。宋人偏爱静观自然,体悟本心,笔下的白露,少了悲秋伤怀,多了安然闲适,其中藏着宋人从容豁达的心境。苏轼《前赤壁赋》写秋江夜游“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”,江上白露如烟,白茫茫漫过江面,江水与远天融为一体,于浩渺秋露之间,生出遗世独立的旷达襟怀。陈与义《秋夜》:“中庭淡月照三更,白露洗空河汉明。”诗人巧妙地将与多种景色组合在一起,造出精巧,生动地勾勒出秋夜天空的清朗之美,给人以全新的感受,道出了前人未曾描绘的意境。诗人不叹秋之悲戚,也未落入悲秋的俗套,而是于露月星河间品味秋夜清趣,实则是诗人以一种更为隐晦而深刻的方式,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。仲殊《南柯子·忆旧》“白露收残月,清风散晓霞”,“白露”既指秋夜的清凉露水,又暗合时节特征;“清风”句则承接前文,描摹清晨破晓的时序光景。白露消尽残余暑热,晓霞在清风里缓缓散开,青山、堤柳、荷花相映,把白露过后江南清晨的清新明媚描摹出来,于风物流转之中藏淡淡的忆旧,哀而不伤。

岁岁白露,朝朝诗流。千年诗韵流传,白露始终是古诗词中最温柔的秋之底色,那些散落于诗词中的白露意象,历经千年岁月沉淀,依旧清辉熠熠,让每一个秋日,都藏着跨越古今的诗意与温柔。